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美] 巴里·诺顿 著 安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美]巴里·诺顿 著 安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美)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著;安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6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书名原文: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ISBN 978 - 7 - 208 - 13993 - 0

I. ①中… II. ①巴… ②安… III. ①中国经济—经
济发展—研究—现代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4169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陈楠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美]巴里·诺顿 著

安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2.5 插页 4 字数 516,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993 - 0/F · 2397

定价 115.00 元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高韵斐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为松 王兴康 匡志宏 朱凌云

吴 申 忻雁翔 范蔚文 徐忠良

出版说明

出版作为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凝结，集聚了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的经验与成果，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飞速发展的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并未削弱出版业的这一功能，反而前所未有地促进了其创新发展。

长期以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始终以弘扬主旋律、引领学术思潮、关注时代命题为己任，并围绕中国发展的重大事件、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理论问题举办“世纪中国论坛”。结合2016年“世纪中国论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融合移动端、语音端等新技术，以纸电一体同步发布的方式隆重推出《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实现了出版方式与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的融合发展，表达了出版人在奉献好书的同时，努力践行社会责任、文化理想的使命追求。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聚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题，荟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奖得主和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等中外著名经济学家的扛鼎之作，著译并重，经典闪耀。

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早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英文版中就预言，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长为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恢复它在 1890 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2014 年，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 20 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为图书新版撰写的长篇序言中特别指出：“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 20 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然而，中国经济自 2012 年增速明显减慢，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奇迹或增长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否改变？对于未来，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信心？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吴敬琏在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一版（2005 年）中，就指出了转型、结构调整不能取得成效的很多具体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抑制或排除了市场的作用。他在第四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在 21 世纪面对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发展转型。”

无独有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先驱巴里·诺顿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中，全面描述和评价了 1949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并把中国的制度转型放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里论述，既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显然，制度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和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在各自的经典作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与《比较制度分析》中，分别从东西方的不同视角阐释了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绩效中的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者曼瑟·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则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这一分析经济增长的前沿性概念，为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演变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

对于那场起始于亚洲的金融危机，沈联涛用《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并警示我们2017年可能发生的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可能引发危机的高杠杆问题，瑞典的邓达德等在《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一书中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并因此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推荐为2015年度图书。

根据“十三五”规划的蓝图，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实现收入翻番的必由之路，其目标就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因素，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启新的可持续增长动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将以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传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编委会

2016年7月

中文版序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三十年的持续增长,使沉睡多年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于是,这一宏伟业绩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就成为世人关心的热点。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两大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二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前者被称为转型,后者则被称为增长。什么样的“转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完成“转型”与“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一幅怎样的图画?中国的转型与增长和世界上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异同与优劣表现在什么地方?为学者甚至一般公众留下了诸多疑问,需要给予回答。古老国家发生巨变的主要力量即经济“转型”,引起了世界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思考和探究。

200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它集中了诺顿教授和西方学者以及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作了全面的介绍和系统的分析,受到了海内外关心中国的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从国外各大图书网站上的读者评论也可见一斑。现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也与中国与读者见面了。中文版的出版,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文本。

在我看来,诺顿教授这部著作有三个主要的优点:

第一,它对中国经济的分析,首先是实证性的,回答的问题首先是事物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例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即使出现了某些规范性的分析,

也是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而在中国传统的经济学著作中，往往不问事实实际如何，先作出事物应当如何的规范性规定，然后推论出它必将如何发展，结果，就使我们的许多经济学著作变成了孙冶方所说的“道德训条大全”，完全脱离了实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有时还摆脱不了传统方法的影响。

第二，与上一条紧密相关的是，本书的分析都建立在经过检验的翔实数据的基础之上，使这些结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例如，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本书首先介绍了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历史遗产，叙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从传统经济中挣脱出来所做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努力，包括建立计划经济的努力，从而为读者理解当前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建立了基础。然后，他用了15章的篇幅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在每一章里，他都是从状况和过程出发，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诺顿教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与他经过严格的经济学科班训练有关外，还得益于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就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处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这一经历为诺顿教授提供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和资料积累。

诺顿教授把他数十年的理论和经验数据积累汇集在这本书里，对中国复杂的经济局面作了清晰的解读，使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所有读者能够分享，值得感佩。还要说明的是，在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诺顿教授对英文版的经济数据重新进行了校阅和更新，使本书提供的资料更为全面和准确。诺顿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本书的研究视角广阔，不仅有宽广的历史视角和全局视角，还有比较的视角。诺顿教授从教育背景来说，学的是比较制度分析。在这本书中，他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专长，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多国比较的背景中，联系其他转型经济体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以及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德国等进行比较研究，更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运作以及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发展。正是缘于诺顿教授扎实的功底，这本书被一些外国学者评价为“是理解和讲授下一个经济强国的标准参考书”。

总之，诺顿教授这本专著的中文版的出版，对于正在总结30年市场化改革经

验和规划下一步改革进程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当然,写书和建筑一样,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当书籍写成出版以后,回头一看,往往会感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诺顿教授这本杰出的著作来说,在我看来,在它对中国转型的两个基本分析框架,一个是“计划外成长”(growing out of the plan),与另一个,也是更主要的分析框架——“渐进主义”(gradualism)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和不够清晰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厘清。好在诺顿教授在书中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可供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吴敬琏

2010年7月12日于北京

中文版前言

自《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的英文版面世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之优异甚至超过了多数乐观学者的预期。2003—2007年，中国还是全球经济繁荣的组成部分，不过，中国竟然避开了2008—2009年最为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截至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恢复到可媲美于危机前的水平。因为这种经济表现，中国在2010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大出乎之前的预期。

过去五年来横扫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诸般大事任何人都没能预见得到，本书初版时也没有试图进行具体预测，但平心而论，过去几年发生的经济事件已经证明了本书所采用的解释架构的有效性。本书基于中国正在经历的结构变化过程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基本事实，从根本上对中国经济持乐观看法。一直以来，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但是，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其次得益于一系列保增长政策。此外，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中国结构变化的步伐较快，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时间都快于和长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情况一如本书初版所展示的：转型和增长仍然是核心驱动力。

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非同寻常的快速转型引出了我们在英文版中很少关注的一些新问题。首先，如此快速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正在接近于发展的末期，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目睹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次，出乎我们的预期，中国已经采用并强化了某些政府控制经济的制度，因

此在英文版中对中国向“更加正常”的经济体迈进的长期趋同过程的描述，较为合理。这一过程目前仍在继续，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宽广的转型道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趋进。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制度趋同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放缓，同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揭示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普遍性问题，这一制度趋同的过程将会更为缓慢。这些变化都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1. 中国与世界：增长和危机

中国是 2004—2007 年世界经济繁荣的主要参与者。这次全球性经济繁荣踩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迅即出现，并非偶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拆掉了其商品生产部门的贸易壁垒。私营部门不仅成了重要的出口商，而且享有更顺畅地获取进口投入品的通道。这些政策导致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加速，中国开始以实实在在的低价向世界经济提供日渐增多的出口商品。与此同时，美国也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允许美国居民增加负债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需求迅速增长时期。生气勃勃的美国需求和丰裕充沛的中国供给相互影响，创造出世界范围的繁荣。中国在保持对美国持续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了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繁荣世界贸易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日渐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和红红火火的国际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加速，2007 年达到了让人惊叹的 13%。但在这些好消息后面，问题也在不断滋生。中国和美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尽管角度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大量的外部顺差(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2007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8%，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贸易之争。然而，结束这次繁荣的并不是中国的外部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性。2007 年中，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已经明显露出颓势，由于房屋价格的下跌，金融体制其他方面的脆弱性马上显现。2008 年，美国全面陷入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也在 2008 年急剧恶化，2008 年 10 月之后，美国金融危机发展成全面危机。

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竟能避开 2008 年 10 月始自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多

方面不良效应。通过及时部署的大量有效的刺激计划,中国得以在2008年底止住了威胁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趋势。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危机的经济体,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全球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对中国来说,21世纪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业绩是21世纪头10年中期的增长趋势加上2009年较早摆脱衰退而发展的总和。

2. 增长的失衡

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化有关。正如本书第6章所说,中国经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点。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意味着,这些独特的结构性特点并未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其实更大地偏离了全球规范。比如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产出贡献在2009年超过了46%这一改革时期的纪录。政府将资源大量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动机是一种短期动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国内需求,因此可以防止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然而,这种短期政策导向也标志着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持续性。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需求的任务(见第14章)。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甚至想创造出新的基础设施供给品的服务需求。从中国2008—2010年的刺激政策看,由于短期政策与现有长期政策配合紧密,所以短期政策的实施非常迅捷,而且惊人平稳。这一结果显然迅速改善了我国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成为全部基础设施都更为发达的国家。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自200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呼吁要有一个更为“均衡”的增长模式以及要转变增长模式。这些目标现在已经包括在2005年通过并于2006年到2010年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之中。这一指导思想是期望采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即更少使用重工业投入(和投资),更多使用中国人一直以来累积的技术和教育的增长模式。这些复杂的变化我们将在稍后作深入的讨论。虽然这一政策也在最低限度上要求拉升中国经济的国内消费比重,减少用于投资和净出口的最终产品比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目标并未实现。由于21

世纪头 10 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比重实质上也在下降。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大大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比重——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 2 到 3 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中的比重也在稳步下降。2009 年，居民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6%。这一数字大大低于诸如美国这类由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国家的数字，21 世纪头 10 年初期，在这类经济体中，消费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 70% 的极端水平，而在 1945 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消费在这类国家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以上。虽然我们没有理由让消费达到类似于美国那样的高水平，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实质性增长可以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更加多样化，也更有意义。此外，消费也是最终需求的最稳定来源，因为消费受到人的需求和习惯的驱动，无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收入如何波动，居民也会本能地平滑自己的消费。与此相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未来预期让人失望，私人投资就可能（理论上）下降至零。虽然中国政府在 2009 年能够很快提升投资水平，但展望未来，对投资的绝对依赖肯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另一失衡指标就是 21 世纪头 10 年一直在发展的大额外部顺差。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外部顺差在 2007 年之前一直在增加，2007 年之后稳定了下来。然而，从 2009 年年中开始，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原因很明显：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之故，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正在下降。2009 年，在世界贸易大幅下滑的同时，中国积极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经济的快速复苏使中国在 2009 年下半年出现了进口需求普遍上升的局面。2009 年年中之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事实上已经减少。因此在 2009 年，净出口已经达到较为合意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5%，2010 年初，顺差还在继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多半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全面重新调整。国外需求的强劲复苏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紧缩，都会很快引发顺差再次膨胀。很显然，中国的增长模式依然很“不平衡”，未来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由投资和出口增长决定。

3. 增长的阶段

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面临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的急迫任

务。中国一直快速地积累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除了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基础设施发展以外,由于新工厂和新住宅的快速开工,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很快。但一直以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也不慢。一直到2000年,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也还只有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0万。小学入学情况的改善意味着,教育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强化。这个数字的变化表明,中国的要素禀赋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不再只是劳动丰裕和土地及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比较优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由于采用了与其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向劳动密集型部门倾斜的增长策略而衍生出巨大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过分偏向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战略。)现在,依赖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期也已经走到了终点。变化的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正在使中国离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把中国推向新的生产部门。

大体上,这种转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渐进而平稳地发生。但这里有两个原因使我们怀疑,这个过程在中国将会更加混乱。首先,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于表面看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劳动储备。随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差不多无限量供给的农民工愿意进入城市从事这类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与此同时,因为相对而言劳动在农村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在外出打工人员离开以后,农业生产还能维持。但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到了尽头。日渐增多的农村调查表明,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已经外出,至少在中国中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那些村庄里,年轻人都已经外出。如我们在第5章所说,这些年轻人外出打工时,几乎都处于15—30岁这个年龄段。现在,整整一代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完全没有直接的农作经验,他们的成长岁月都在求学和寻找城市工作中消耗掉了。为了从更为遥远的乡村吸引农民外出打工,为了吸引那些可能已经在农村接受过其他良好的职业教育的人外出打工,城里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比如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工资已经开始大幅上涨。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始于2006—2007年。然而,这一过程却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下滑而中断,当时,许多城市工人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但由于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

的快速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又重新振奋起来。因此，珠江三角洲出口加工区的工资上涨压力较之以前更为明显。在其他发达地区，尤其是浙江和苏南地区，也明显具有相同的压力。

对很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或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供应时期已经走到尽头。1954年，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过剩”经济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Fei Jinghan)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 Ranis)对这一思想作了详尽阐述。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强调，成功的发展可以通过“转折点”来推动经济。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认为，过了这一转折点，工资将会大幅上涨，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减少，他们经常引用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来支持自己的理论。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转折点，接下来将会出现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变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确信他们所谓的“转折点”真的能带来这种激烈而突兀的变化。或许，类似于中国台湾这种小型经济体能够出现这种独特的转折点，而中国这种大型经济体是否也会因一个突然的转折点而成为某种经济体，眼下还不甚清楚。或许中国将发生的这些变化会成为更为渐进和长期的转型过程的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由于人口变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在第7章已经描述过在过去20年使中国获益的人口“良机窗”。从现在开始——2010年之后——这个良机窗将逐渐关闭。因为中国人口出生最多的年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新生劳动力的最大群体已经在过去5到10年中进入了市场，大批新工人的出现也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总体保持了较高水平(也会对那些寻找工作的工人形成挑战)。从现在开始，进入市场寻找工作的新人将逐渐减少，预期这种情况也会使中国的总体增长率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也会使寻找工作的年轻工人感觉轻松)。这些变化也会促成类似刘易斯和费景汉及古斯塔夫·拉尼斯所描述的由于“转折点”而发生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理论上，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转变可以以一种平稳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然而，其他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超快速增长阶段转型，常常会引出动荡。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韩国的增长模式也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的

困难。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向前发展的增长潜力似乎更大。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这些先行经济体在到达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末期时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基于国内市场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和其他先行经济体经历过的增长率暴跌的覆辙。但是，这种经历也可以成为一种警示，即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转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此外，理论上较为平稳的经济变化也常常会受到现实中不可预期事件的扰乱。中国现在正在进入通常已经预见到的转型时期，但人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一转型会在2015年之前开始。驾驭好这一转型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绝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4. 驾驭向新增长模式的转型

中国政府已经设计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划。我们在上文讨论了政府的希望，中国政府不仅希望增长模式更为“平衡”，而且希望降低过高的投资率和外部顺差。现在我们明白，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就算最初是）出于对静态的“平衡”问题的考虑，更是希望借助于中国已经累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成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难的政策挑战。长期内，市场力量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中国经济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加昂贵的劳动力与更为丰裕因此更为便宜的技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已经驱使中国进入了新的比较优势领域。这种自然演化会因为中国的巨大规模而更加容易。从国内来看，中国的国内市场如此巨大，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和工商企业有大把的机会适应新的市场并扩大经济规模。从国际来看，中国已经参与了差不多每种商品的制造，所以与那些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的经济体比较，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及进入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相对而言更加简单和直接（见第16章）。因此，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挑战是，他们想作出多少努力来推动并加速这些变化。

与此同时，现有市场力量已经把中国推入了资本密集行业领域，比如钢铁行业，这种行业都是极端能源密集和污染行业，而且需要密集使用中国短缺而且必须进口的资源（高质量的铁矿石）。因此，就算中国生产出比世界上所有经济体都要多的钢铁，中国好像也不大可能在这一部门拥有可持续的长期比较优势。这些